

附件 B

尊敬的托雷斯法官，

我知道，可能有不同的人已经向法官大人陈述了他们对我的故事的想法。但是，我认为，让法官大人直接听我讲述我的故事是非常重要和关键的。我今年45岁，在生活中扮演过不同的角色：女儿、妻子、母亲、姐姐、雇员和中国民主运动成员。

我出生在中国实行“独生子女政策”之初。我出生后，父母又先后生了一个女儿和一个儿子。由于“独生子女政策”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我的妹妹在出生后几分钟就被杀害了。我的父母决定留下我的弟弟，因为当时的习俗认为男孩以后会养家糊口，延续血脉。但我的父母却因为留住了他而面临重罚和降职。

我妹妹的去世对我母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她的后半生都深受打击。她因肺癌去世时年仅49岁。我真的相信，妹妹的死给她造成的终生创伤导致了她的去世。然而，在我母亲去世几年后，我父亲被诊断出患有与我母亲相同类型的癌症，并在61岁时去世。在我父母去世前后，我所在社区的一些人也被诊断出患有不同类型的癌症。我意识到，我父母的癌症很可能是由于暴露在与煤矿开采相关的环境毒素所致。在我的家乡，采煤是主要的收入来源。自来水通常每天只能使用2到3个小时，天空总是灰蒙蒙的，空气从不清新，所有东西上都有黑色的残留物。

2000年，我在大学里认识了我的丈夫。他是我的第一个男朋友，我是他的第一个女朋友。他性格沉稳、安静、尊重他人、谦逊，这些都是中国式良好教养的典型特征。我们成了最好的朋友，一起做一切事情，比如上大学和规划未来。而这一切都在2016年结束了，中共国安局和警方逮捕了他，企图胁迫我返回中共国。中国共产党（“CCP”）之所以要抓我，完全是因为他们的目标郭文贵先生，以及我的雇主、总部位于北京的北京盘古投资有限公司。尽管我丈夫没有被指控犯有任何罪行，但他还是被拘留了12个多小时，在没有机会阅读文件的情况下被迫在文件上签字，并被要求在只有一行签名的空白文件上签字。获释后，他被强制要求在我每次试图联系他之后向警方报告。两年后，他们在诱骗我回中共国未果后，强迫我丈夫与我离婚。那时，我的儿子、我们唯一的孩子才5岁。

中共强迫我丈夫与我离婚后，将重点转向了我弟弟。多年来，他一直受中共国安局和警方的严密监视，即使在他照顾我父亲期间也是如此。2022年，我弟弟被捕，家中遭到搜查。我弟弟当时才三十出头，由于被捕、抄家和照顾父亲的压力，导致他患上了糖尿病和高血压。在

我祖父

中风后，我成了他的看护，照顾了一年多，直到他去世。我亲身体会到这样的角色是多么辛苦和紧张。我弟弟现在需要依靠药物治疗，而且很可能终生需要。弟弟承担了许多家庭责任，尤其是我身在美国期间。我看到他已经成长为一个非常有责任感的男人。我常常想，在父亲去世后，是他真正激励我变得坚强并追求自己的人生信念。

我一直认为自己是个人勤奋的人。在中国读全日制大学时，我同时辅导三个孩子，利用课余时间接送他们往返于家和校园之间，为我父母减轻一些经济压力。在法国读全日制大学时，我做过服务员、寿司厨师和私人家教。回首大学时光，我没有任何空闲时间，总是忙于学习或工作。

我大学毕业后的第一份全职工作是在北京盘古投资有限公司（“盘古”），这是一家由郭文贵先生家族拥有的公司，我在那里工作了10多年。盘古在北京经营着一个高端综合体（“盘古大厦”），其中包括写字楼、公寓、酒店和几家餐厅。我最初受聘担任业主的秘书和翻译。后来，我晋升为国际关系总监。我的工作时间很长，节奏很快，几乎无法兼顾工作和生活。但是，我接受了这样的工作，因为我想谋生，想养家糊口，想为儿子的教育和家庭不可预见的医疗费用存钱。盘古公司一直对我很好，甚至给我双倍的带薪产假。当我决定辞职养育儿子时，他们告诉我，如果我想回来，他们会立即重新雇用我，他们也确实做到了。

2015年，盘古公司派我和几位同事到纽约出差，计划3到6个月后回国。当我获悉中共派出警察和国安人员前往盘古广场时，事情发生了令人不安的转变。他们开始逮捕几名家庭成员和员工，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逮捕行动不断升级。2015年9月，我从纽约前往香港，寻找回家的机会。2015年底，我的同事之一回到北京，落地后就立即被捕了。2015年至2016年，我往返于香港、纽约和伦敦之间，耐心等待回国，但极度担心如果回国，会被中共逮捕。到2017年7月，在我离开香港前往纽约两个月后，我们的一位香港同事被绑架并秘密运回中国。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离开过美国。在此期间，我的家人都很担心我，让我不要回去，注意安全。

2017年至2018年，我经历了人生中最艰难的时期。我被多重危机压得透不过气来：父亲的病，丈夫和弟弟受到中共越来越大的压力，以及对我和家人可能被逮捕或被迫害的恐惧。父亲去世3个月后，我因胃部肿瘤住院。虽然诊断结果为非活动性癌症，但我出现了严重出血和血红

蛋白水平显著下降的问题，需要多次输血才能切除肿瘤。

大约在这个时候，我们的中国民主运动（也称爆料革命）兴起，使我成为了中共的直接目标。他们每天骇客我的电子设备，在互联网上散布虚假信息、篡改的照片和假音频。一觉醒来，我就会看到被篡改过的家人照片发布在互联网上，其中包括我4岁儿子的照片。我手机里保存的任何东西都有被泄露的危险。甚至连我儿子的照片都无法保存，这让我非常心碎。我失去了中共和国和香港银行账户的访问权限，我相信这是中共所为。我的医疗记录被黑客入侵并发布在互联网上。我有时会被中国人跟踪。情况变得非常恶劣，以至于我不得不在纽约最高法院民事法庭针对一名中国男子申请了永久禁制令，他就是几年来“网络攻击”和跟踪我的人之一。除了我的雇主（郭先生家族所拥有的企业）为我提供的标准薪资待遇外，他们还为我提供了个人安保保护和交通服务。我父亲去世后，盘古公司帮助我弟弟安葬了我父亲。同样，我在医院做肿瘤手术时，郭先生的女儿郭美帮我管理我的个人事务，每天陪在我身边，成为了我最好的朋友之一。我的雇主待我如亲人，这就是为什么我除了拼命工作外，还对他们非常忠诚的原因。

我并不想为我所做的错误选择辩解，但我确实认为，让法官大人此时了解，我当时生活中发生的许多创伤性事件对我的判断力产生的影响是非常重要的。我相信我的雇主在我人生这些创伤时期帮助了我。我的工作是我当时唯一真正的社交渠道。我现在认识到，我应该多问一些问题，然后说不，但在当时，考虑到正在发生的其它一切，我的工作成了我的整个世界。

我从未想过要造成伤害，我深刻理解血汗钱的价值，这体现在我对本案中遭受重大经济损失的受害者深表同情和惋惜。我理解他人错失的机会和损失是无法弥补的，也认识到自己在脆弱中的挣扎。我对此感到非常难过和歉意，由于我们的原因，投资者在海曼基金中损失了3,000万美元。同样令我难过的是，投资者失去了GTV-，这是第一个支持民主、反对中共的媒体机构。我非常尊重美国的法律制度，并致力于了解和适应其做法。我感谢美国提供的保护和机会，并将坚定不移地继续努力弥补和纠正我的错误。

我理解阁下，通过阅读这封信，对我的身份信息了解有限，而我唯一的身份证明——中共和国护照刚刚过期。从2015年至今，中共对我的迫害已持续了将近10年，这导致我无家可归，成为无国籍人士。经历不仅仅取决于发生在我身上的事，还取决于我如何应对这些事情。我相信有一天，当我的儿子长大成人后，他会寻遍世界，试图找到关于我的任何信息。我不会，也不能让他失望。如果有机会纠正我的错误并弥补，正如我的祖父和父亲教导我的那样，跌倒之后重新站

【中文翻译 仅供参考】

案件号：1:23-cr-00118-AT 文件号：469-2 提交日期：2024年10月4日 第5/5页

起来是至关重要的——我承诺会做到这一点。谢谢您，法官大人，感谢您抽出时间来阅读我的故事。

诚挚的，

王雁平

日期：2024年9月30日